主题：刘元春（20190903上午）

时间：2019年9月3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刘元春：今天我给大家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上一周我才接到了学院的课题，宏观调控挺好的，如果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话那就不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下，所谈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以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构建在整个理论体系之上。很多的学生和一些学者都认为，把西方经济学框架下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应用到中国，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很肤浅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它的实践基础，有它特别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就是有它的历史基础，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国家目前现有宏观调控体系它的格局，它的这种历史沿革，它的这种理论基础，以及我们在这些年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创新，那么我们就可能认识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怎么发生的。很多学者都在争论，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有一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最近我们在帮国家智库基金，在设计一个重要的大的研究项目，有两个亿，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它的理论体系。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典型事实，突出特征，来总结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不太一样的地方。再从不一样的地方研究典型事实、典型规律与一些经典理论不一致的地方，然后再来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有它独特的内涵。这种独特的内涵，我们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可能面临着很多的张力，这个张力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一些经典理论简单地进行推论，简单地进行延续，就会出现这种张力。因此大家就会看到，总书记在517讲话当中，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当中，在资本论150周年的讲话当中，这一系列讲话当中很重要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一些大众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在很多内容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中国化的一种很典型的方式。但是讲到这些，绝对不是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我们恰恰是要把中国的这种实践把它分析清楚。所以我今天主要讲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历史沿革。第二个是当前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框架体系、主要的特点。第三个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和方向。

首先我们说一下宏观调控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又是什么？我们在经济学理论里都会谈到的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政策、法规、计算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和干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是2018年的定义。如果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里，大家都知道，在宏观经济学没有诞生之前，宏观调控当然也没有。这个理论很重要的就是开创了西方宏观调控的新时代，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体系里面大家都会看到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效需求管理，而这个管理主要体现在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体，来实现我们宏观调控的几大目标。当然，在体系之后大家也会看到西方学者通过整个一系列的流派，特别是新古典综合，所推演出来的各种总需求、总供给的模型和分析框架。基本上把宏观调控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思想进行完善，对这面的政策工具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当然，这里面的争论就非常多了，不管争论有多少，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讲，或者说西方这种典型的实践逻辑来看，宏观调控就是一个逆周期调整。他们认为，宏观经济里主题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增长，第二个是波动。增长的核心从中长期来讲，市场是有效的，因此，只要各种外生参数、各种政策既定，增长就会自然发生。所以说它不需要短期政策来为中长期的增长进行过度的关注。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所衍生的就是自然率的概念，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些年里一些传统的教条已经在危机时代和后危机时代进行了全面的突破。另外一个主题，对于波动，特别是凯恩斯主义体系和新凯恩斯主义体系认为，应该交给宏观调控。而波动很重要的原因来源于周期性的变化。因此，宏观调控本身就定位于反周期的调整。因此，在放经济学框架里，或者说在欧美的一些宏观调控实践里，宏观调控的目标、对象很简单，它的对象就是以波对为主体，以逆周期调整为主体，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短期环境。

因此，我们通常所分解的四大目标节出来了，它的就业目标、通胀目标、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增长目标，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也是这几大目标，当然这肯定是错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或者说我们的宏观调控，它不仅仅定位于我们的逆周期调整上，不仅仅定位于短期波动的调整上，很重要的就是要定位于我们整体的跨期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发展上。而完成这个目标的是通过规划，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在关注波动里面不是简单的周期理论，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所谈到的整个国民经济再循环、再生产理论，以及我们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理论，这个危机理论大家都知道，它与凯恩斯所讲的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根源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宏观调控，还要根植于赶超体系和赶超目标。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自发秩序，就是新古典主义强调的一种先发国家、先行国家，它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所展开的交换关系，它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这种生产体系里面，要完成落后国家的赶超目标。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它对资源配置的方式，它的所有制的安排，它的政治制度的安排，所衍生的经济资源的配置，与世界经济体中心国家的配置方式有根本性的差别。

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宏观调控它的目标跟西方不一样，它不仅有短期目标，还有长期目标，它不仅仅有局部的工具，还有各种各样整体的规划。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内涵，就与我们通常而言的这几大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很严格地界定宏观调控的内涵，有些人广义地把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干预。他们认为，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就是市场失灵，特别是我们学校微观经济学的很多学生学完之后，一谈到政府干预，马上就会归结到我们的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赶超经济体里面，在外围国家里面，它的市场失灵是无处不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即便我们在微观里面没有系统性失灵的现象，但是在宏观上的问题它会全面呈现。也就是说，这里马上会引发的是我们简单地从市场的微观失灵，很难引申出我们的宏观调控，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只能引申出我们的一些独立政策，引申出一些微观管制。但是，引申不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很重要的根源在于宏观的社会经济系统循环出了大问题。在凯恩斯通论里面，他认为是因为市场的价格黏性，和我们各种消费倾向、投资倾向的新的尹祖所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总供给不成立，导致宏观调控有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有很多学者会发现传统的微观失灵和宏观失灵，不一定能引申出动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资源配置都很有效，但是你不能够看到在不同阶段里我们增长的有效性，所以我们会看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动态失灵，来为西方的宏观调控弥补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即便目前整个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关系，也与国内很多的一些学者所理解的有了较大的差别。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这种理论基础和现实的逻辑基础与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经济学理论是穿着中式服装，打的是西装领带，说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混搭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准确。比如我们举个例子，第一，我们的宏观调控里面最为重要的、最有特色的工具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的财政政策有特点，为什么财政政策也特点？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跟人家不一样，这两个回答都是错误的。我们最具特点的是规划，我们从1953年所开始的一五计划，一直到现在的十三五计划，然后到今年已经全面开启的十四五规划。因此，宏观调控里面最强力的机构是谁？发改委。比如我们现在每年的GDP增长目标由谁来确定？每年的货币供应量的目标由谁来确定？还有我们其他一系列的目标由谁来确定？很多人会想，我们的物价目标2.5%左右，这应该是央行来制定，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每年都是这么做的。增长目标谁来确定？也是央行确定。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观点是错的。我原来去货币政策委员会去开会，也经常到发改委跟他们座谈，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目标都是发改委定的，不是财政部，也不是人民银行。你就会发现，发改委主任是政协副主席，宏观调控的政策大大超越了财政部和人民银行。

因此，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为什么要这么进行构架？比如说美国、欧盟，他们基本上不会做五年规划，也不会做十年到二十年的中长期规划，更不会像我们制定这种几步走的发展战略，也不会有特别清晰的产业政策。因此大家也会发现，目前中美之间的冲突里，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对于我们的产业政策，对于我们的一些战略性规划，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们的产业规划。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中国通过一系列的规划和资源的配置，顺利地实现了赶超，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这一套体系里，跟人家有本质性的差别。当然，我们还有更大的差别，原来我们说宏观调控的功能肯定是政府的。政府在国务院的几十项职能里面只有两项职能，一个是规划，一个是宏观调控，然后进行分解，到各个部门。但是现在大家知道，按照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党管经济，党管经济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要降息加息最后拍板的是谁？不是易纲同志，他只能提建议。你会发现，央行的运转体系跟美联储的运转体系完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根源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很多的海归回来，有从加拿大央行回来的经济学家。他说刘老师，我在国外的央行干了很多年，想跟你聊聊。最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他根本不懂中国的这一套运行体系，中国的这一套运行体系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同时它根源的基础和理论，也与大家想象的不一样，这不是凯恩斯理论体系。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从80年代一直到2008年之前，甚至2013年总书记提出新常态理论之前，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把这一段时期归结为短缺型的凯恩斯管理模式。到了2008年以后说是充裕型的凯恩斯管理模式，你如果看到这样的文章，你就可以下结论了，这一类学者基本上不懂中国的宏观调控。原因是什么？他还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宏观调控。所以我们给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应用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各类政策、道德、行政等手段，对经济关系与经济运行状态进行干预、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在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上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偏离战略目标和宏观目标的各种倾向，以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第一，我们会看到，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里面的制度组成部分，我们在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一般就会先说所有制的制度基础，然后再是运行体系，按照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等模式，来谈运行体系。然后就是在制度里面谈我们的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就和我们在计划经济体系里面不一样，计划经济里面是完全管制的，通过计划手段全方位地进行配置资源，是统购统分，经济主体基本上没有多少灵活性。这是按照原来极端的理想的模式来构建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体系里面不存在宏观调控，只存在整体性的布置和一种管理。因为你要调节调控，这里面是有区间、有工具、有杠杆，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也会看到，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所根源的制度基础、运行模式、差别，导致它的内涵，实际上与西方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的沿革能够看得出来，最早讨论宏观调控的是马克思的晚年，在第二国际，包括列宁，他们都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原来探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通过政府干预，能不能避免它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得出的理论很简单，是不能避免的，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

当然，如果从西方本身来讲，他们也讨论这个命题，他们讨论的是利用宏观调控能不能够消除周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和欧洲从90年代到2008年之前，全世界出现过一个长达20年的景气，我们经常把这个景气叫做大缓和理论，美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大缓和理论。美国的一些大牛在2006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宏观调控学的伟大胜利，宣布以这种规则化的货币政策为主的西方宏观调控体系，解决了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总是使周期开始消失，美国好几个大牛写了好几本书，200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人的信息怎么这么足？他们宣告周期已经消失掉了，规则化最简单的就是它以规则为主体宏观调控模式，成功地解决了波动的问题。没想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直接导致我们讲的宏观调控学的新共识全部崩溃，货币经济学里面美国最厉害的学者，他在2006年的时候提出了整个宏观经济学里面的十大新共识，新重要的就是规则化货币政策的伟大胜利。大危机、大萧条一出现，特别是大家知道，从这几年全世界出现的大停滞来看，这个理论是凯恩斯的学生汉斯在1937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在2011年开始复活了，复活它的人是谁？是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怎么才能走出大停滞？这里面马上引发的就是我们这十年里面，美国为首，欧洲中央银行为首进行的量宽等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几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原来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现在的第三条腿是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就发现原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所跟踪的目标，基本观念都错了。美国马上出了几本书，叫做逃不掉的经济周期，后来他们说，不管你是通过国家干预、宏观调控，都逃不过每到十年二十年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全面盛行，原因很简单，大家讨论的问题又回到了从前。因此，原来我们的理论里面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这个争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当年布哈林在苏联现实操作过程当中产生的一场大的争论。这个大的争论后来大家看到的就是计划经济的一套体系就诞生了出来，我们要用计划的模式来克服市场的问题，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但是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提出了一些理论，列宁原来所设计的过渡期是很长的，包括布哈林也认为很长，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老要犯一些激进的问题。过去我们即便实行五年计划，也是比较激进的，市老是往前赶，苏联也是一样。苏联的斯大林，按照计划经济体系干了几年，然后就马上要急于在50年代宣布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一上台，然后就进行纠正，他说社会主义有先进期，有高级期，他认为他进行了一些重新的划分，而实际上大家要注意的是你去看书面的文献，有时候能我们后来的很多争论的影子看到。因为赫鲁晓夫提出的三统三合理论。我们在1949年也制定了过渡时期的纲领，也颁布了共同纲领，因此，国家对于宏观调控非常重视。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陈毅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调运全国的各种物资，与上海的资本家和一些投机者进行对抗，利用国家机器，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投机者处理掉了，通过物价管制、通过行政调配，把城市里面所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行管理。比如说现在有好几个国家有恶性通货膨胀，比如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最近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物价水平也是两位数地增长，委内瑞拉好像已经到三位数了，很多人说共产党在进行恶性通货膨胀治理过程当中的方法，完全可以向这些亚非拉的兄弟介绍一下，因为这些方法很管用。我们在解放的这几年，的确通过我们的一些行政手段和一些国家机器，把这个东西弄好了，但是我们好像已经把这一段时期忘记了。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进入到了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系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大家可能会看到总书记讲的对70年的总结，不要把前30年跟后40年进行割裂，但是我们大量的学者还是愿意把它割裂开来的。最近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要跟我约70年的宏观调控，我一直不敢下笔。我怎么能够把宏观调控放到70年的纬度里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给大家上课的时候，我又把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我赶快地把原来的文献和经济史重新翻了一遍，才把这个历史纬度梳理了出来。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宏观调控，原来所根源的计划体系、规划体系，很重要的根源在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里面，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过去的成绩是什么样的，在现在的成绩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学者跟我的关系也不错，一谈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就说我们是简单的开放、简单地跟随了华盛顿共识，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所带来的增长。我说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其他国家都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了。这70年里面，中国的经济体系里面有几个东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没有变化，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宏观调控体系里面的计划、规划体系没有变化。第三，建立在国民中长期规划、短期规划基础上的产业政策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梳理出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在什么地方，大家说公有制肯定是一个基础性，但是让右派分子总结的话，他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公有制逐步逐步地减少，是私有化的结果，他这是另一个视角。我们现在说市场化，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体系和竞争体系，的确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家没有看到，第一是规划，第二是产业政策。大家会看到，在产业政策上，林逸夫老师进行了很多的总结，产业政策到底还是坏？去年还争得面红耳赤，这个问题需要争论吗？不需要，因为美国人早就给出了我们答案。中美贸易冲突有三个核心问题，表象是关税和利差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问题，然后是形势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根源于我们的技术改造，根源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我们的产业政策，和我们的补贴政策。因此你会发现，让美国人全力以赴地对抗我们的产业政策，这说明我们的产业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莫迪现在说，我们一定要向中国学习，别人说你学习中国的什么？第一，你学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有点够呛，但是莫迪说我不学习国有企业，我应该向像中国一样，要有五年规划和各种编制，并且要把这些编制和规划，体现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上，大家要了解因乌的莫迪经济学，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中国。但是第二个要学习的是全面地进行教育普及，印度很多的经济学家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不是像我们所总结的中国成功的经验是全面开放、全面市场化、全面私有化。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也说要向中国学习，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容易走入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要向全世界兄弟国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发展经验，这个发展经验就是我们的规划为什么能实施，我们的产业政策为什么能够一以贯之地来进行？原因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这个体系，是保证我们这些工具得到良好贯彻的有效途径。我记得我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因为我们很多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的确比民营企业差一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比同类的民营企业的财务指标还要好。最近的几个现象，比如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营经济的利润同比增长7.6%，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2.3%，当然这里面马上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增长7.6%，那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利润不厉害。

但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国有企业的绩效是一塌糊涂，民营企业的绩效还不，那时候说要国有企业有什么用？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传统理论当中对国有企业所有制在现代经济体系里面作用的总结没有总结好，就是你为什么存在？你财务不行为什么还存在？也就是说，微观效率指标和财务指标都比较差，你还存在的话就是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当时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宏观效率论，宏观效率论里面就包括我们所讲的在宏观上所实现的动态资源的配置效率。我们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一个反周期的运动和调控，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比如现在经济不行，总理很着急，号召大家要六稳。第一个是稳就业，跟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说稳就业是不行的，但是国有企业如果不执行的话你的乌纱帽就要掉了。第二，稳金融稳投资，投资也是一样的，民营企业现在都不敢投资，国有企业必须投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很多的行为是逆周期的，不是顺周期的。你要把美国的这些企业的各种指标拿来对比，你会发现美国西方经济体系的所有市场主体都是顺周期的。但是我们国家你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它的投资行为，它的一些购买行为是逆周期的，这是大家要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不愿意用一些用一些新的思维和方法证明这个问题。我们说，国有企业逆周期行为，在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认识到的。

第二个，国有企业的一些战略行为，比如我们在一五、二五布置的150多个重点项目，一般按照私营的模式你可以布局吗？布局不了，因为不挣钱。比如我们再举一个打官司最厉害的案例，美国人现在研究我们的国有企业了，因为按照WTO的规则，我们应该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他们应当自动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和国家的地位，但是欧盟没承认，美国也没承认，老在打口水仗，美国人说你们从来不遵守约定，你加入WTO，你答应要怎么怎么调整，结果你什么都没调整，美国人在中美贸易战里说，你现在答应给我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是我不相信你，因为中国人老骗我们，因此我要在你中国进行可实施性的制度安排，就是我要派驻结构性调整的工作组，来监控你各种制度和结构性调整的方案。我们就会发现，贸易战就成为了舆论战，舆论战出来体现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你说我不守信，我说他不守信。我们在美国进行收购，在德国进行收购，在其他国家进行高科技企业的收购，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中国在进行一些战略性资源和一些关键技术的企业收购方面的邀约价格比其他国家的邀约国家高三分之一以上。最后你就会发现，美国人感到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像蝗虫一样，在全世界啃食他们一些敏感的企业，把他们全部收购了。那么他们成功收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代表自己的企业，代表的是国家，他的成本收益曲线是什么？全社会的成本收益曲线。而美国的企业，这些竞争的企业就是私人的收益与成本。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政治站位高，都是代表国家、民族的，所以他说我把这个东西进行收购我几年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和大规模的推广，我的平均成本曲线就会大幅度下降。这个平均成本曲线第一个算的是动态，第二个是把这个范围经济、规模经济都纳入了进来，还把学习效益也纳入了进来。所以，中国的这些企业的行为模式，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导致的静止是什么？他说是不公平竞争。表面上我们都是市场机制的竞争，但是他说西方的企业在跟中国一个国家在竞争，你用的是社会成本曲线、社会收益曲线，而他们用的是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因此，美国的很多学者从学理上来论证国有企业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合格、标准主体。

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美国人要把中国人打趴下，一定要改变国有企业的模式。它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党指哪它就打哪，他有时候是亏本的，但是把技术弄回来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不亏了。因此我们就会发现，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所存在的动态的宏观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跟你不一样，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战略规划、产业规划、技术规划很重要的一个承载体。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的基础，跟我们原来简单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衍生的基础有一定的差别。也就是说，你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有预期，有控制。比如说为什么要国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消除私有制所带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剥削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价值再实现问题。这样就可以防止大的经济危机了。那你就会发现，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所承载的防止剥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的再平衡和动态平衡，它的作用有没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设计的那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多。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很多基础，我们要去重新寻找，要去挖掘。我们的宏观调控理论也要去挖掘它。但是这个挖掘是不是就要到西方经济学里面挖掘？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这一套东西肯定是人家反对的。但是有人说，我们能不能回到共产党宣言里挖掘？去年我们的一些学生闹得很厉害，小孩子们出现了极左思想。我去年当了经济学院的院长，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解决性骚扰问题、西二旗的学运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对马克思理论学得很好的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都看得很通。看完资本论之后，他们还去一些工厂里面看，然后他们就会被洗脑，说你看中国现在多黑暗？而且小孩会提出来回到原点，我们要回到共产党宣言。第二，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们派了很多干部跟他们进行解答，最后发现我们的政工干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三下五除二就缴枪了，因为不过他们。他们站在学术、道德的制高点，后来我们就说亲自上吧，好歹我也读了几十年的资本论，

我说我们聊聊共产党宣言，我说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了，第一个版本是什么版本？第二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后来的传播路径是什么？马克思晚年又是怎么反思的？后来很多学者又是怎么争论的？小孩在这方面肯定读得比我们少。我说，比如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糟糕的时候2002、2003年，我们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但是我们现在基尼系数降到了0.46%，基本上就在0.46%的水平。我说这个原因是什么？你要思考一下。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贫困发生率，我们在厉害的贫困率在什么时候？1977、1978年，但是我们现在的贫困率已经降到了1%以下。我们的这些工厂里面，各种黑工厂，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第一代农民工的时候，90年代。我说现在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好多了。我说很简单，为什么有些人不在90年代高举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而现在才提出这些东西？我说你们要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在这些年里面，总书记带领大家把贫困问题、脱贫问题划时代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大家还反而要提出反对。

去年春节的时候，王沪宁常委把我们叫去，我给他汇报，我说我们现在的理论创新当然有很多，但是管用的很少。我说我们的理论还要长点牙，要有动作性，但是这种动作性不是简单地喊口号，不是简单地回到经典，不是简单地说几个名词。第一，在这种思潮里面，你能够很好地进行对垒，很好地进行理论的说明，因为我们的学生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他们都是抱着很真诚的目标来的。我说你不能把他当做敌人，我们是做教育的，始终要把他当做学生。但是他们在理论上走到一个死胡同里，你要把他从死胡同里引导出来，你需要更高更好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创新就非常重要了，而我们现在在经济学这一块，总书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但是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总书记自己讲，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大家没找到，这就麻烦了。人民大学也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但是最后上面好像都不满意，因为发现不对。跟总书记现在提出的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现代高标准体系、高标准开放体系等等这样的战略体系不搭配，反而还有各种概念。我们说，一种理论一定要推动时代的进步，那才是好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论价值失踪了，而我们在计划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的配置思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里面有一个有机的融合。所以，小平当年所提到的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论。但是大家要牢记的是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但是再推论一下，市场经济里面有计划，计划经济里面还有计划。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宏观调控里面的一些理论，这70年里一以贯之的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规划里面有很多的新的发展和新的进步，但是它的基础理论跟我们一些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一致性。虽然它有新的形式，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挖掘这个，我们编教科书的时候也没有挖掘，我看了这么多教科书，好像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的人很少，就是说市场经济里面的规划、计划的功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如何使计划的手段、工具有效地与我们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之间有一个有机融合，我们这个理论没有。反而我们一味地强调了另外一块，因为我现在不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了，我现在在世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一手好牌全被你们打烂了，你们有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打不出来？

所以大家会看到，计划经济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论，大家会看到就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需求，财政赤字率、外贸赤字率不能太高，这和原来计划经济谈到的国民经济综合评论论是完全一饮的，只是运行机制有所差异。当然，最近宏观经济学又有了新的突破，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是MMT，叫做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一个最简单的推论是什么？只要没有通货膨胀，赤字永远不是问题。第二个推论，只要国家的生命是无限的，赤字也是没问题的。这几个推论很厉害，美国也在讨论，讨论的背景就是全球债务率已经达到了330%，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债务率是多少吗？最新的数据是262%，日本的债务率是410%。但是在这种状况里，比如说美国这两天有可能要停摆了，因为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21.4万亿，又达到了上限。特朗普很着急，他要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要一万亿。但是这一万亿肯定发不出钞票，马上有理论家给特朗普提出了理论炮弹，赤字不要紧，财政赤字本质上就是发钞票，如果发钞票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发钞票？第二个逻辑就是债权债务，实际上在本质的体系里面，债权债务都是平衡的，因此不要把债权债务的上涨和收缩看得那么重。第三个逻辑是个人是有生命周期的，因此我们经济学讲，上半生借钱，下半生就要还钱。因此，他说国家有跨级最优决定吗？没有，国家是无限存在的，只要你相信债务可持续，他就可以借钱还钱，个体没办法一辈子借钱还钱，但是国家可以。这些理论对我们传统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国民综合评论理论，以及现代宏观调控的平衡论。这些理论好像有点异端学说的味道，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好好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搞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窄了一些，特别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定要视野特别概括，要善于吸收西方的最新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瞄准的经济最新的问题提出来的，而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面临。比如我们的财政赤字率，名义上我们的财政赤字率只有2.5%，高的时候是2.8%，不超过3%。但是日本我们把投入平台，把一些隐型债务，把我们的养老金，四种账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广义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了9%，比如1到7月份我们的地方债券新增2.14万亿，去年一年才2万多，今年前七个月就把去年的干完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它的度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综合平衡理论在一些常态化的运行里面非常重要，但是一些超长体系里，可能还有问题。这个理论本身我们一直还坚持得不错。当然我们就会看到，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个不断的构建过程当中，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也在不断地构建。我们在不断的构建过程当中，改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绝对不是简单的按照华盛顿共识，所给出的宏观稳定几个建议来进行构建的。它的历史痕迹和历史的延续的性是非常强。比如十二大，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进行协调发展。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于是国家的调控开始出现了。1984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决议里，很重要的就是直接提出了宏观调节的说法，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这些宏观调节大家就会看到，它会综合运用价格之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理、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这些调节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宏观调控，或者说西方的宏观调控有很大差别。

大家会发现，西方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范畴。对于比例的调节，西方不调整比例，他认为结构性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的一个责任。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提出了结构调整的方案，他们认为，中长期的一些问题、市场体系出的问题，有结构性政策。但是结构性政策和我们说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不一样，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是我们的一些规划，是我们的一些区域规划、产业规划、技术规划来实现的。那么在之后，由于我们在转轨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混乱，所以后来又把转轨和宏观控制结合起来，所以大家看到1985年，人民日报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加强宏观控制，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解决宏观管理与微观搞好之间的矛盾，当时这个认识还很粗浅。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个管就是原来所理解的过渡时期的宏观调控，当然我们目前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十三大的报告里面，把宏观调节体系作为改革的任务来进行强调，基本上就认为宏观调节与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离开了宏观调节、市场会乱，企业也会乱，这个宏观调节是管控规制的概念，而不是现在宏观调节的概念。

1992年南巡讲话，特别是十四大以后，很重要的就是从过去有商品的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把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里面。这个文件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因为大家会看到，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大、十九大表述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国家的作用，并且把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宏观调控主要办法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在1993、1994年进行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第一，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转制和民营经济的促进和我们的外资经济发展，但是保持了国有经济，这是很重要的。第二，虽然大规模地明确财政、货币政策在调控中的地位，但是没有放弃计划调控，在我们宏观调控当中的主体位置。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对于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制为主要目标来进行调控，中央银行法是1994年颁布的，中央银行法颁布之后，我们现代意义的央行体系才出现。大家知道，80年代的时候，从人民银行中间剥离出一个银行叫做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就不起在计划经济里面传统的存款、放款的功能，不起经营功能，它是专注于中央银行的制度。后来1998年把开放银行剥离出来，建立了一系列的政策性银行，又从商行银行体系里面剥离出政策性银行，后来又成立了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把银行监督职能从银行剥离了出来，从而使人民银行成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位置，计划、金融、财政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是我们中国宏观调控矿芽当中最核心的问内容。

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最为重要的就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从宪政高度上明确了的制度性特征，宏观调控是我们基本的制度性安排，但是这个宏观调控不是大家理解的狭义的西方模式。2012面的十八大，很重要的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第一步强调的是战略规划，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工具、目标、在体系当中比西方复杂得多。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很多人也在说，美国的政府机构很少，很明晰，但是我们的经济目标和西方具有很多本质性的差别。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同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四个板块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方向只有一个，把第14个方面列成了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把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进行了规定，第一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第二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第三，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第四，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任务与西方所讲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与这四个目标完全不一样。

第一是有逆周期的调节因素，第二，很重要的是有中长期的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也就是说中长期的发展功能，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是，我们还要关注潜在产出增长速度。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面，大家都知道潜在产出，我们能不能去影响它？很多人认为不能影响它。但是这些年，这个命题也被颠覆了。为什么被颠覆了？有一个命题叫做萨伊定律，就是供给创造需求，总量实行自动平衡，经济会怎么样？沿着潜在增长的路径波动性地进行前进。所以我们通过生产函数法、结构法等这些方法，就可以把这个潜在增长、产出水平撤出来。因此，在西方宏观调控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遵守自然率的规则，第一个就是要接近自然失业率，利率水平要接近于自然利率，这是他们的几个信条。但是现在的信条是自然率不自然，萨伊定律命题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长期的连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会在中期出现自动的萎缩。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必定会引起中长期的自然增长速度的下降。短期不努力，你长期肯定要图伤悲。因此，一个国家不仅仅要在短期里面进行熨平波动，更为重要的是你要在短期进行中长期要素的培育，也就是说进行资本培育、人力资本培育、技术培育，这几大定律必须要有它的载体，就是它的蝉翼是它的载体，它的企业是它的载体，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因此大家就会发现很重要的理论，这几年的宏观经济学日新月异，有很多的新命题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实践里面已经讨论过了这些问题，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我们有时候在想，中国这些年，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搞得挺好，但是理论自信的确很糟糕，我们在理论上的确没有搞出新名堂。这几年，我们很多人在立志于要创建中国经济学流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中国增长这么厉害，如果我们要在这一方面用点工夫的话肯定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几个学者励志要得诺贝尔奖，第一个当然是林逸夫。

有一次开会，林老师讲完了，然后就是我讲。然后就讲了理论创新，我说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理论创新得太快，为什么？因为理论创新得太快，就可能成为约束我们行动的东西。所以，有些理论不能乱构建，林逸夫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以为我在说他乱构建。第二个是李稻葵，他现在在清华搞了一个SAGE，大致意思就是把中国运行的模式里面提炼出一些新思想，他让我当他的学术委员。我还总结出的14个新概念，要在这14个概念里面建议新体系。第二个新现象就是这两年学术界在打架，经济学创新奖有一天就让双轨制的学者得了奖，大家把文献梳理的很清楚，谁最先发表，谁最后发表，然后马上就也一个老师说这个是他最先提出来的。后来故事越演越烈，他们还在打架，我说为什么还要打？有什么争的？他说这个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会发现，在利益方面大家都忘记了斯文。大家也时候相互之间的攻击已经到了骂家的地步。但是你会发现，中国学术界在蠢蠢欲动，这是好现象，各路人马都在准备着，不管是拿诺奖还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最近也在整理这些东西，比如在全世界，这些最右刊物里面研究中国模式的大幅度增长，从中国模式里面提炼出新规律的问题也开始大幅度增长，并且很多老外以在全力以赴地研究中国问题了。原来都是中国学者在国外留学，然后在国外的留学刊物发一些骂中国的文章，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因为你再骂中国人家也不相信了，毕竟增长得这么好，这都是一帮坏人吗？那不可能，按照很糟的方法，结果做出一个奇迹，现在开始挑战美国了，你还去质疑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提炼、怎么形成一些新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挖掘我们中国实践的历史脉络、历史逻辑，第二个就是在历史逻辑过程当中来总结出新的规律。第三个就是在新的规律里面来衍生出一些新的理论。第四，在新的理论、新命题的基础上，形成我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这里面要有几步走的战略，还不能说一蹴而就。

刚才我们谈了历史沿革，主要的框架体系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看到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所强调的重大制度安排。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框架中的一部分，最为明确的就是宪法第十五条，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人把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了宏观体系，因为市场经济和之间当做是响声相伴的体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方面要有微观有活力的市场运行体系，同时还要有宏观有度的调控体系。当然还要有资本基本的制度体系，所以大家会看到高质量发展里，要求的两个纬度。第一个纬度是产业纬度，产业纬度就是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再加上人力资源相互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而制度体系是什么？是市场体系有效、微观体系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这是它的制度基础。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就在于，第一它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领导，第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相并存的所有制基础上。第三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几个很重要的基础就决定了要贯彻党的总体意志，特别是党的战略意志，党的战略意志就是每隔十年二十年都会有一些战略规划，最为明显的就是十九大对于未来两步走进行了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要贯穿到一些宏观调控体系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制度里面刚才我讲的，要通过对于经济主体不同层级、不同模式的调节和调控，来实施它的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通过国有企业来进行逆周期调整。第二个，我们通过土地制度的调整、土地规划的调整来调节整个房地产市场，调整我们的一些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的行为，西方可能就没有。比如土地很简单，在地方的税里面，最大的地方政府收入里面，过去的十多年里面，40%几的地方政府收入是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受受到调控？受土地规划调控，原来国土资源部和发改委进行规划，你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把土地进行调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土地指标用完了，对不起，你想卖土地是很难的。当然，我们现在又采取了很多其他的新的举措，比如说增减挂钩，你在农村凭着很多宅基地、空地，你就可以增加城市的土地供应量。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中国特殊土地制度上。一方面，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所以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由于不是私有制，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利用城乡土地，来完成了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寻找城市土地杠杆。如果像一些拉美国家，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它的城市发展不可能详中国这么迅速，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像中国这么迅速，因为它不可能通过卖地来积聚资源。同时，由于它的土地由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导致很多土地规划也做不了，但是中国可以做。所以我们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各种发展如果没有所有制基础那是很难做出来的。所以你不了解这个，你就只知道一个公有制按劳分配，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土地制度的所有制安排，以及在这一个城乡二元经济体中的作用在城市化、工业化当中的作用在过去十多年，它是全面凸显的基点。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李璐里面，要重点研究的就是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土地价格剪刀差形式，所以我们70年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很好地利用了几个剪刀差，第一个剪刀差，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们是利用工农价格剪刀差，完成了工业的原始积累，把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各种农产品价格很低，然后进行收购。第二个价格剪刀差，农村工进城打工，城乡工资价格剪刀差。第三个剪刀差是什么？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我们社会主义不同阶段利用这三大剪刀差，就利用得很好，如果用西方经济学里解释，一种商品要搞出几个价格，那怎么能行？我们的一些要素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比如金融约束论，对于不同经济主体和产业它的贷款利率不一样，在发展当中的作用也不一样。这种制度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决策模式、传导机制、目标盘殊、工具内涵、理论基础与西方宏观调控具有本质的差距，所以在座的各位，以后人家跟你聊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要局限于财政、货币和总量调控，不要简单地局限于逆周期调节。对于中国来讲，结构与总量是并驾齐驱的。短期和中期是并驾齐驱的，规划与市场是并驾齐驱的。

第二，一元化的调控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全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统一部署下，来安排落实各项政府调控规划和政策任务。刚才也同学问，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实施宏观调控？不行，这样会乱，这也跟我们的权利体系有关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保障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宏观调控配置在中央政府，经济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土地质押，通过打造投入平台，进行大规模的举债，通过合作，能够大规模地把银行的贷款贷给政府，政府来进行开发和投资。这就是竞标赛，但是中国的财政竞标赛跟美国的联邦财政不一样，美国联邦财政还有州财政，而且是各自进行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跟大一统、跟美国的联邦财政不一样，所以中国特色的财政体系也体现得很明确。中国统一实施宏观调控权力的是谁？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2018年3月份将中央领导小组改成中共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所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讲到，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权力很明确，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省委书记说，这里经济不行，我把利率调低一点，我马上让银行给我多贷款，我这里经济不行，我马上放债，最后就会发现省委书记就会像路易十六一样，所以很多地方债务高举，原因就是分税制，我们的财税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中央就把这些权力逐步地上手了，财权、事权要匹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就是国务院，国务院的职能中第五项第六项都和宏观调控有关，第五是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财政政策规划都由国务院进行管理。第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但是目前大家一定要记住，国务院对经济的管理，最终还要归到党中央。第三，多元的调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目标第一是总量，第二，是结构，第三是中长期，第四是短期逆周期，第五是金融风险。刚才有同学问我，安全问题是不是我们宏观调控当中的一个目标？是，因为很多风险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而重大风险里，特别是金融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体系。比如财政风险，有些地方财政的赤字已经很高了，导致教师工资发不出去，最后教师就会罢工闹事，这就是重大风险。还有一个就是稳定市场预期，预期管理也是它很重要的任务。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跟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任务不太一样。201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创新与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意见》，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把跨周期设计纳入了进来，所以很多人说，这几年结构性强调了很多，是不是这两年的创新？大家记住，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里，非常重视结构问题、比例问题，社会主义宏观调控里最大的特点是注重结构、注重动态调整。第四，多元化的手段体系，目前的手段体系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不仅仅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包括规划。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手段很多，十一五计划改为了十一五规划，进行多规合一，然后进行空间规划，现在这个新的规划理念又出来了，它也属于宏观调控。

在这个调控手段里，第一个就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1952年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进行一五计划，起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98年3月恩将国家计划委员会该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且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很多人说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中国的第一大部门是谁？是发改委，它是宏观调控里面权力最大的部门。2003年，把原经贸委和体改委并进来，改成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计划二字完全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但是计划的功能没有消失。大家看它的主要职责，一共有十多项，第一是组织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它是三个层级，一个是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统筹协调社会发展，同时提出各种目标，交全国人大进行批准。所以经济发展、价格水平、重大结构目标都归发改委管，因此，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很多部门要把它汇总到发改委，很多人说发改委是什么？小国务院，原因就是这个。我们在50年代高岗当发改委主任的时候，权力比总理还要大，政务院里面最小的职能就是管外交的。第二个就是负责监测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承担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的责任，第三是负责汇总分析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情况，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制定组织事实价格政策。中国的农业部相当于美国农业部的三分之一的功能，因为农业的收支归财政部。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农业的投资归发改委，还有一些归水利部，最后你会发现，中国的农业部是权力最小的部门，所以我们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美国农业部的部长权力非常大，因为这几个权力部门把他的权力分食了。大家会看到十三五规划期间的指标，分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是预测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要完成的，所以我们五年有中长期规划，有战略规划，比如小平同志的三步走，跨度是70、80年。我们这次分两步走是2050，这些计划是层层分解的，比如6%到6.5%的GDP增长速度，有些人在说，为什么是6%？第一个6%对应的就业是多少？对应的各种参数是多少？国家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国家会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里跌破6%会怎么办？如果今年跌破6%，明年也跌破6%，最后发现2020翻两番，双挂钩、全面小康完成不了，总书记说这是我们对人民庄严的历史承诺，必须要完成。很简单，6%是政治任务，第二个才是经济学家论证一下，我们能不能达到6%，如何才能达到6%。最后发改委说就这样吧，区间调控。人民银行就按照这个来做，你的货币怎么来匹配，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新动作，要求涉农指标，合理的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速，6%再加上一个3%左右的这个水平，你的GDP就是百分之九点几，因此社会融资总额的速度不要低于10%，M2应该在9%到10%之间，但是现在才二点几，很多人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有点紧？最近大家说，你是不是应该又要降准降息？大家会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指标是层层相扣的，比如我们做预测的，做宏观分析的很多人，有些人不懂这一套，他就拿着计算机在那儿算，算出来的都是错的。原因就是他所设计的模型跟中国经济运行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十二五的完成情况，人民银行主要是货币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家会看到，很重要的标志性的是1995年3月18号，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当然首要标志是1983年国务院做出决定，由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规定了10项职能。另外是把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大家知道，工商银行现在是全球银行，他在全世界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上万个分支机构，然后现在它的市值全球第一，利润全球第一。为什么它厉害？因为它原来底子就好。财政部也是这样，这是一个体系。

这些年的主要创新是什么？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主要创新就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各项具体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一就是在党管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党统管宏观调控的新格局，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实力力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当然这只是我们理论上的。第二，在科学研判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长期趋势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大判断，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理论和新常态宏观调控框架，这是很重要的创新。有了新理论，这个理论第一就是根据新常态理论指住中国宏观经济所处的阶段，既不是经济危机阶段，也不是常态下的平稳期，而是处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因此，三期叠加推演出了我们的宏观管理政策不同于西方简单的危机管理模式，第二，也不同于一般的反周期调控框架。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什么？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目前，迈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框架是什么？服务于民，迈向高质量发展。第二，指出增速下滑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趋势性因素。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不是教条式的保8、保7，中国宏观经济不仅要防止短期下滑，部分对冲周期性力量所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要清楚趋势性下滑因素所带来的增速下滑，是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在短期对冲的，趋势性鲜花的解决方案必须从结构和制度入手，必须从中长期进行统筹，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不仅要全面调整稳增长的内涵，更为重要的必须从传统的单一目标扩展到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基础上。最近还加了一个保稳定，这很重要，刚才有人说了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也是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稳定。第三，在战略判断的基础上，抛弃西方危机管理的强辞职，放弃大水漫灌的调控模式，创新性地确立了区间调控的宏观思路。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新举措。一方面在把握好总供求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明确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为区间内运行和区间外运行准备不同的政策工具，以防止经济画出合理区间。另一方面，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保证稳中有进的策略，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采取条结构、控风险、促改革以及民生建设等工作。目标是多元的，工具也是多元的，这里面就要求它的协调性，所以大家会看到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还有注重预期引导，这几方面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这几年宏观调控的创新。

第三，超越西方教条，依据中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来制定和实施短期宏观调控，以保证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战略定力来自于什么？一个是研判，第二是我们中长期的规划和中长期的改革。所以服务于中国大改革、大转型以及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保证宏观调控短期与长期的有效结合。大家会看到宏观调控的几大定位和定义，跨期资源配置，要实现动态的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第二是体系化地赶超，我们要学人家，要规模化地学人家，集体地学人家。所以有人说比如2025中国制造计划，在本质上是中国集体盗窃的规划，他认为我们2025是盗窃美国技术的集体盗窃，当然，有些还是说到了点子上的。第三，竞争性战略实施，我们赶超，同时还在竞争，所以我们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体现得最明显。国际贸易理论里面有一个新理论叫做战略性贸易理论，这是日本人最早实施的，但是后来克鲁格曼把这些理论模型化了。第四，防止社会再生产的失衡与系统性危机，以马克思危机管理理论为基础再生产理论，第五才是逆周期调节。体系化赶超里面还有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些定位很明确，西方经济学只能解释第五个方面，这几个方面要求我们用中特思想、马克思理论，作为它基本的框架和思想来源。但是你简单地去套用也不行，有时候很多人副要去硬套，脑子这么大戴这么小的一个帽子也很头疼，当然，脑袋这么小戴这么大的帽子也很麻烦，有时候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来套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帽子，什么创新都没了。然后中国增长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件，他非要用一个要素来解释，这更麻烦。

第四，在各类传统政治工具传递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异，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过去五年不仅进行了工具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大改革重构了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第一，社会总体宏观政策方面，全面强调系统性风险的管控是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把宏观审慎监管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行的三大经济改革政策之一，这是我刚才讲的三条腿走路，实际上我们是四条腿了，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话，我们是千足蜈蚣，跑得快跑得稳，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的很多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当然，这些年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并行的三大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在宏观调控体系上成立了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第二在货币政策上，将社会融资总额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同时创新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克服了以往简单靠外汇储备占款发行货币带来的各种问题。这几天大家热议的是什么？LPR这个优惠贷款利率，利用这个工具实施汇率市场化和汇率的并购。你会发现，我们的汇率体系很庞大，各种问题有很多，有很多的新工具，政策利率里面的贷款工具有短期贷款便利SLF、MLF长期贷款便利、再贷款。第三，在财政侦测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了上限，加强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控，创新地利用地方债券，PPP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手段，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收支调控的结构。第四，大力进行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创新创造环境。最为标志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全面实施，为各种利率工具调控创造了环境，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形成和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为政府财政转型打下了基础。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年的变化特别快，我现在天天搞宏观发现特别累，为什么？一点不看就有点过时了。并且我们要跟国家的这些部门进行探讨，要出主意，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你给国家出主意要有敬畏心和责任感，如果上面不听你的还好，你可以随便说。就怕上面突然听了你的，你出的馊主意，把国家弄到阴沟里面去了就麻烦了。所以，胡鞍钢同志一吹中国第一了，弄得全国人民都在骂他。当然，中国有很多方面是第一，但是不是所有都是第一，特别是军事方面我们不是第一。德不配位、财不配位，你还要出很多馊主意，这就叫做国夭。第五，根据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适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很重要的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改革，但是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凸显在供给侧。一方面使我们的调控要更加注重供给侧调控，更加注重结构性问题，更加注重改革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谈了很多分析，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六，形成了稳中有进的宏观调控总的工作基调和方法。第七，形成了大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开放体系与国际协调体系。开放体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必须在开放条件下来考虑它的调控，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汇率改革，把汇率工具利用好，因为按照蒙代尔的匹配法则，目标和工具要匹配。你有N个目标，但是你只有N-1个工具，最后是无解的，你就不可能完成你的目标，所以按照蒙代尔所谈到的匹配法则，政策工具数量要比目标数量要多。而我们宏观调控的目标要多，稳增长、惠民生、共风险，保平安，这么多的目标怎么办？因此我们建议你的工具也要有很多，那么你就要创新工具。你按照原来简单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成不了，所以我们有规划，我们要把汇率工具利用，我们要把宏观审慎监管用好，要把产业政策利用好、区域政策利用好，甚至我们还要把一些行政手段利用好。下一步的壮心和完善思路，最重要的体现在文件里面，就是7月1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创新与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意见》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纳入到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上，要纳入到高质量发展的上面。第二个就是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做好跨周期设计，跨周期设计大家可以挖掘一些理论出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坚持区间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积极推进国际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目前阶段性的改革目标是什么？第一是到2022年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适应、比较健全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到2035年，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智力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有效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如何进行完善，第一就是强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第二是坚持宏观调控基本取向，这是国家文件，宏观体系怎么更为科学化、稳定化？宏观目标更为明确，因为我们现在九龙治水的现象比较严重，调控叠加的现象比较严重，微观传递效率比较低下，中长期的衔接不是太好，这些问题都很多。第四就是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划分之间的综合平衡。

宏观调控体系怎么做？政策体系怎么做？第一，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第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财政里面，金融危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财政政策的地位，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凯恩斯主义体系里，我们要突破流动偏好陷阱，靠的是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体系里面，财政政策就是小姐的身份，货币政策有点像丫鬟的身份，就是说有主次关系。但是，当货币主义到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时候，对于李嘉图等价出来之后，他们就认为不要相信政府，特别是不要相信财政，财政面临的是基本效益，赤字越来越多。第二，今年发的债务肯定会抵消未来民众的支出，因此会出现一个在跨级上的效率，因此，财政不要用得太猛，凯恩斯主义引申出来的是功能财政管理，后来新古典引申出来的是平衡财政管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早就超越了功能财政观，全世界的政府赤字率、债务率都很高，所以大家会发现财政的作用又要重新定义，这就是MMT理论，开始为财政的定位重新塑造。数量宽松、超低利率、大规模地发钞票等等这些货币政策都用出来了，但是没效果，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很有可能日本化，出现世纪的现象，低增速、低贸易、低利率、低价格，因此，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萨默斯提出的是大胆地进行财政政策，当然大家的争议很大。第四，有效增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作用。第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强化内外安全政策，刚才有人问，安全是不是手段？是的。第六，加强各领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协调，这种协调有很多方面。

未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遇到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怎么做？第一，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数据失真，统计体系老作假，害得我们搞宏观的有时候也没办法。当然，对我们还好一点，因为我们了解现实，和大量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沟通。害惨了国外的同行，他们搞中国宏观，一看中国宏观数据就说要崩溃了，把中国的数据按照他们的理论一推，真的要崩溃，我们经常说这些数据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有些是假的。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假数据的水分剔除掉，要从真实的角度来观察国家的运行，这是你的超级本领。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这个历史的角度就是我们70年来所坚守的所有制，坚守的计划规划的调控手段，坚守的产业政策等等，是我们宏观调控当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第二，我们必须要从市场经济改革建设的过程当中，辩证地看待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构建的过程，也就是说，市场化是我们宏观调控建立的一个核心背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管理的一些先进经验，但是我们也保留了传统经济体系的一些方法。第三，我们必须要从理论创新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它的基础绝对不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而是构建于我们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综合平衡理论、再生产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还有我们的赶超理论等等这一系列理论当中。通过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养分，来形成它的基础。

第四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确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框架、机构、工具、目标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个区别第一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第二个是我们的宏观调控里面，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并行的，总量与结构是相并行的，短期与中长期相并行。我们一定要明确地看到，不是像他们讲的简单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整，我们的定位很多，我们的工具很多，我们的目标也有很多，同时隐含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多，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第五，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依然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特别是新常态宏观理论出台以后，在这些挑战出现之后，我们以新常态理论、高质量发展理论为基础，所构建的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有重大的创新和重大的突破，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不能用老观点，用传统的教科书来认识当前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六，下一步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地完善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条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做政治经济学的，做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不当之处亲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